

试论宋代四川经济特殊性

吴擎华¹

【摘要】 四川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 and 经济地位，宋朝在该地区实施了多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促使四川经济演生出特殊的发展道路。本文试图从两方面来分析宋代四川经济的特殊性：一、特殊的经济政策；二、特殊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宋代；四川；特殊化政策；特色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04) 010080 -04

四川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状况，其地四塞，江河纵横，与外界联系较为困难，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和完整的经济区域。鉴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和经济地位，以及宋灭蜀后蜀人对宋朝政权并不欣然归服，宋廷为了安抚蜀人和稳定西南，对四川采取了特殊的治理政策。其所实施的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政策，导致并加强了宋代四川经济显著的特殊性。

一、特殊的经济政策

宋廷对四川经济特殊化政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赋税制度；（二）禁榷制度；（三）货币制度；（四）对谋利士人的特殊照顾。

（一）赋税政策特殊化

在赋税问题上，宋廷在四川的政策经历一个由轻赋到重赋的变化过程，同时在赋税结构方面，四川地区的商业税居主导地位，赋税中钱匹帛的比例较重。

四川在宋代远离京城属于边远地区，宋廷收复四川后大力推行减税政策，“祖宗时，蜀中供正赋之外，惟有三路绢纲三十万匹，布纲七十万匹，每匹为直三百文，而茶盐酒皆未有禁榷，是供之外，一岁供地方仅三十万缗也（原注：绢直九万，布直二十一万）”^{（1）}，四川的赋税较其它地区轻。淳化二年，因“剑外赋税轻，曾遣监察御史张观按巡四川各地，‘因令稍增之’，张观进谏道：‘远民易动难安，专意抚之犹虑失所，况增赋以扰之乎？设使积粟流衍，用输京师，愈烦漕挽之力固不可也！’太宗深以为然，遂不果行”^{（2）}。但随后四川赋税逐渐加重，徽宗宣和三年（1121）“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之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3）}。南宋时期四川的赋税已经十分沉重。“盖昔者张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养兵，乃以五路财赋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谓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4）}。南宋人估计四川增赋大概，周南认为：“国民初尽变五代烦细之赋，至天禧而方宽，至熙宁而复增，及渡江以后，则四蜀之赋，增之数十倍，……”^{（5）}。到南宋末年，随着军费开支的剧增，四川的赋税日益加重。魏了翁曰：“江上之总领自朝廷岁计其费，为之科拨，而四川之岁不能半其出，则朝廷不问也。”^{（6）}宋廷对四川地区的赋税由北宋开始轻赋税（低于其它地区）到南宋重赋（高于其它地区）的转变，完成了从一种特殊到另一种特殊的转变。

（作者简介）吴擎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8。

（二）禁榷制度的特殊化

宋代的财政特点是“重征榷轻正赋”^{〔7〕}。赵宋立国,即在工商业领域全面推行禁榷制度,举凡茶、盐、酒、铁、矾、香药等大宗商品均加以禁榷,其实施范围遍及东南各地及北方、西北广大地区。然而在四川地区,由于其当时特殊社会现状,四川地区的大宗商品经历了由“通商”到“禁榷”的变化。“蜀初年,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8〕}因此,没有推行禁榷制度,而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茶法方面,“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由买卖,禁其出境”^{〔9〕};在盐法方面,“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四川地区则“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郡卖,唯不得出川峡”^{〔10〕};在酒业方面,“川峡不榷酒,河北不禁盐。”^{〔11〕}北宋前期官府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不禁茶盐酒类的大宗品。正如司马光所言,在川峡四路,“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12〕}。

北宋熙宁年间,宋廷经营西北边疆,为用茶叶购买马匹,在四川地区,禁止茶叶商营,设置茶场司统一购销,实行官买卖的禁榷制。官府在四川行榷茶之后,“至令市井商旅,动皆失业”^{〔13〕}。南宋初年,赵开一是榷盐,“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翕张”,于是“公私病之”^{〔14〕}。二是榷酒:“先罢公努卖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则“民始病矣”^{〔15〕},赵开隔槽酒法的特点,在于把官府和买扑酒户所垄断独占的酿酒业,扩大为任何人只要纳钱就可经营酿酒业,以此来刺激酒业的发展保证酒课的增加。并且以此来革除官酿官卖的贪污谋私,经营腐败和买扑酒坊逃避酒课等弊病。

（三）货币政策特殊化

四川地区在地理上自成一体,社会生活和经济上也自成一个单元,尽管宋代四川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很频繁,但就其水平来说仍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其货币制度因特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宋廷特殊的货币政策而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货币区,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专用铁钱,并最早发行纸币,其发行的货币,一般都只在川峡四路行使。

四川产铜较少,西汉以来就曾使用铁钱,五代孟蜀时期四川铜铁钱兼用。北宋统一四川后,四川财富大量运往开封,“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又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二。”^{〔16〕}这一举措,一方面运走四川的财富,一方面又禁止铜钱入川,这一政策与北宋在平灭其它各国后实行的以铜钱统一货币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使得四川地区的货币由此前铜钱为主,铁钱为辅的铜铁钱并行朝专行铁钱的方向演进,四川逐步成为铁钱区。开宝三年(970年)宋廷“诏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并“禁铜钱入川”^{〔17〕},这样一种增铸铁钱与禁止铜钱入川交相并促的政策使得四川地区最终成为铁钱的流通区。其后宋廷曾数次试图铸铜钱投入流通,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宋代四川铁钱区的形成既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同时也有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状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因四川商品贸易的日益增多,铁钱又不便于交换,故在四川地区最早产生了纸币,史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18〕}。对此吕祖谦有更明确的表达:“蜀用钱铁,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便。”^{〔19〕}交子的产生得到了宋廷的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设置益州交子务,天圣二年宋廷正式在四川发行第一界官交子。这一政策使得交子发行流通兑对有了法律支持,使得四川地区交子得以正常流通,这是宋廷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而实行的一种特殊货币政策。

关于纸币在四川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贾大泉在《宋代四川纸币》一书有详细论述:“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已经达到需要大额纸币的水平,才是纸币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和决定性的条件。加上宋代四川行使铁钱,官方又不发放交引等信用票据,货币流通中的矛盾更为尖锐;以及宋代四川高度发达的造纸印刷技术为印造纸币创造了条件和金融信用事业发达等等因素,从而促成了四川成为我国和世界纸币的发源地。”^{〔20〕}

（四）特殊的谋利士人

关于宋代四川的商人，贾大泉在《宋代四川经济述论》一书中，从“大批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者的出现”，“专业商人队伍的壮大”，“士大夫和官僚兼营商业的人数普遍增多”，“官营商业队伍的膨胀”四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21〕}。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一书从特殊的地理环境分析了四川商人的产生发展^{〔22〕}。宋代士人经商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士多出于商人家庭，以致士与商的界限日渐不清。

在宋代许多读书人欣然下海，蜀地士子似乎表现出更大热情。南宋宁宗时，每逢科举大考之际，别的地区士子总是星夜赶考，但四川的士子却总是姗姗来迟，到了规定日期还不见进京，其原因并非仅是路途遥远，途中经商也是迟到的原因之一。“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天津。”^{〔23〕}对于那些颇有商业头脑的四川士子来说，因为蜀道之难，平常难得有机会出川到东南地区，借进京应考之际，正好贩运货物沿途贸易，又因一路关卡手续繁多，所以常常迟到。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反而迁就成全，不得不延期开考，封建社会的尊严俯就于商业谋利活动，在中国科举史上也实属罕见现象。

二、经济特殊化政策产生的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的经济五花八门，不复一致。在其后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如何统一全国的经济，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宋王朝始终没能齐一。因此不得不因地制宜，各地区实施了一些不同的政策。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及其特有的民情，是宋廷在该地区有目实施的特殊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

（一）政治上的“重远”原则的体现

宋四川地区特殊化政策的实施，首先与历代封建王朝政策上的一种传统倾向性有关，这种倾向性就是“重远”。宋人苏洵曾作有《重远》一文，认为：“国家分十七路，河朔、陕右、南广、川峡实为要区”^{〔24〕}。这种倾向性认为：离朝廷越远的地区，就越应受到重视。当时四川离首都都有数千里之遥，且由于高山阻隔，其与外部联系较弱，“封闭性”很强，对这样的地区，宋廷自然会给予特殊重视。更主要的原因是四川特殊的自然历史状况和重要的经济地位。

四川地区是我国古代开发和发展较早的区域之一。远在秦汉之际就已成为“陆海”，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唐代有“扬一益二”之佳称。唐末五代，中原混战，四川社会较为安定，中原衣冠士族和广大人民纷纷入蜀定居，视为乐土。故四川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入宋以后，四川地区的经济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货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25〕}，至有“万货均输若流泉而富国”^{〔26〕}之说，经济实力较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地区以其丰富的产品同夔峡诸地进行贸易，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汴京的经济，对宋代经济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强化起了重要作用。文同《成都府运判厅宴思堂记》云：“惟剑南西川，原野演沃，氓庶丰夥，金缯絮，天洒地发，装馈日报，舟浮輦走，以给中府，以贍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倚之，因以为宝藪珍藏云”^{〔27〕}。当时“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安枕矣。”^{〔28〕}进一步说明它对宋王朝财政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范百禄在《成都古今集记序》中写道：“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贍。势望雄伟，卓越他郡，朝廷席五圣之基，基万龄之泰，明烛外遐，爱均畿辅。凡迭建师长，必一时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后以尹兹土。其优馭西南之意，概古邈矣，非独隆于今也。蜀之所以为重于天下，虽穷隅舌，咸共知之。”^{〔29〕}

根据“地愈远则任愈重”^{〔30〕}的“重远”原则，距首都千里之遥，且又有山河阻隔的四川地区，其地位已非同一般，再由于其重要的经济地位，这样四川地区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文同说：“蜀为远邦，邑曰巨镇，其政系于国体，所寄继于上心，地望素隆，事权时重。”^{〔31〕}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丞相以成都守臣当更，其所以宜往省名陈于上前。曰：‘是其职序才业皆可以称其任，惟上之所择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内之蕃城号为至重者，举莫若吾之全蜀，壤

土衍沃，民欲丰夥，外之则八国种落赖以绥辑，内之则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异他所’”^{〔32〕}。在宋室君臣看来，四川已是天下“号为至重”之城，对这样的地区，为有效治理该地区，当然必须重视官吏的选任，选拔“强有智敏，所临课力惟厚”的官吏，同时，为了使“民之利害得以共除，吏之善恶因而惩劝”宋廷自然会“以重柄委之外台”^{〔33〕}，给地方以较大的自决权。

（二）因地制宜，顺应蜀地社会民俗风情

另一个始终影响宋廷对四川地区实施特殊化政策的原因就是它对四川地区的特殊民情的认识。宋人陈师道在谈论四川“宜得一时之士，以为百吏之师”的原因时说：“惟兹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远人异俗，未知劝禁之方，下吏浅闻，莫谕天人之际”^{〔34〕}。宋廷平四川后，即将后蜀孟氏集团沿长江水道徙往汴京，据载，蜀主孟昶离开四川时“万民拥道，哭声恸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而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35〕}。在宋廷看来，后蜀统治集团在四川是深得人心的，为了消除四川人民对孟氏的怀念，宋廷必须实行一些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统治政策来笼络人心。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宋灭后蜀仅用七十六日，史家惊叹“何其易也。”^{〔36〕}但随即而来的是以全师雄为首的蜀卒之乱，后继起的是王小波、李顺于永康军起事，战火绵延川峡各州，历时两年，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对宋廷冲击较大，连宋太宗都“下诏罪己”^{〔37〕}。经过这些事件宋廷总结四川的社会民情是：“蜀人喜乱易摇”^{〔38〕}。“性轻扬，喜虚称。”^{〔39〕}由此看来宋廷对蜀地民情的认识直接导致其特殊化政策的实施。

三、结语

宋廷在四川地区实行的护商政策，轻赋废禁政策，及特殊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的经济发展。护商政策的实施使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商人队伍迅速壮大，经商人数量快速增加，从业人员多样化，商人资本急剧膨胀。史籍常有“蜀郡……某氏多货”、“某氏产刀钜万”^{〔40〕}的记载。足见其商人资本非同一般。轻赋政策实施，使四川地区的民力得到休息，史载：“百有余年，民甚安之。”^{〔41〕}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禁榷制的废除，自由通商政策的实施，使得四川的茶盐等大宗商品流通无阻，交易畅通，其生产大规模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四川地区出现了蚕市、药市、花市、茶市等。交子的发行和使用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使小农小工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使商业信用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宋廷对四川的特殊化政策是宋代四川地区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M）.淳化二年二月丁卯.
-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六四川桩管钱物（M）.
- 〔3〕宋史卷174 食货上二（M）.
- 〔4〕斋集卷4（论蜀札子之一）（M）.
- 〔5〕历代奏议卷56，周南对策（M），786.
- 〔6〕鹤山先生大全集卷44（M）.重建四川总领所记（M）.
- 〔7〕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 (8) 邵氏闻见录卷1 (M) .
- (9) 宋史卷183, 食货下五 (M) .
- (10) 宋史卷181 , 食货下三 (M) .
- (11) 宋史卷298 , 燕肃传 (M) .
- (12) 涑水纪闻卷15 (M) .
- (13) 净德集卷3 (M) .
- (14) 宋史卷183 , 食货下五;朝野杂记甲集卷14 (M) .
- (15) 宋史卷185 , 食货下七 (M) .
- (16) 群书考索后集卷61 引宋会要辑稿 (M) .
- (17)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1 (M) .开宝之年十一月条.
- (18) 宋朝事实卷15, 财用 (M) .
- (19) 历代制度详说卷7 (M) .
- (20) 贾大泉.宋代四川纸币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 (21) 贾大泉.宋代经济述论 (M)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
- (22) 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研究史 (M)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 (23) 宋史·选举志卷159 (M) .
- (24) 文潞公文集卷18 , 乞另定益利钤辖司画一条贯 (M) .
- (25) 净德集卷14 (M) .
- (26) 西台集卷8, 贺本路运使郎中启 (M) .
- (27) 丹渊集卷23 (M) .
- (28) 范文公正公集卷26 (M) .
- (29) 宋代蜀文辑存卷22 (M) .

(30) 攻集卷36 成都提刑杨王休本路运判知阆中续耆成都府提刑〔M〕。

(31) 丹渊集卷33 成都新平赵龙图先状〔M〕。

(32) 丹渊集卷26 送赵大资再任成都府诗序〔M〕。

(33) 丹渊集卷33 运使苏刑部行状〔M〕。

(34) 后山居士文集卷12 代谢西川提点刑狱表〔M〕。

(35) 蜀机卷下〔M〕。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 〔M〕。

(37)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6 淳化五年九月〔M〕。

(38) 景文集卷60 宋府君墓志铭〔M〕。

(39) 宋史卷292 田况传〔M〕。

(40) 忠肃集·拾遗〔M〕。

(41) 宋史卷174, 食货上二〔M〕。

(责任编辑 张 斌)